

有蟲還是無蟲？

——中國上古醫療史中的“蠱”*

陳嘉禮

提 要

中國醫療史的研究在過去百年得到長足的發展，然而，“蠱”作為一個與疾病有關的名詞，雖然在古代醫學或非醫學的文獻中屢見不鮮，但前人多把視野聚焦在畜蠱害人之上，忽略了“蠱”在醫學疾病中的意義。本文以甲骨文、清華簡及其他先秦文獻入手，探索“蠱”在先秦時期的含意，並討論古人防“蠱”與治“蠱”之法，亦會窺探上古醫療疾病觀。

關鍵詞：蠱 寄生蟲 防蠱 治蠱 上古醫療史 上古疾病

一、前 言

早在 20 世紀初，中國史學界已經開展對醫療史的探討，有關醫療史的課題亦受史家關注^[1]。就上古史學界而言，相關論

* 本文乃提交“中國的變革與傳承——青年學者學術研討會”（香港浸會大學，2013 年 12 月 9—10 日）之論文。本文提及的醫學知識，蒙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學院高加信博士及仁康中醫中心洪俊強醫師惠告，特此致謝。

著陸續發表了不少,1943年胡厚宣《殷人疾病考》比較有系統地利用甲骨文介紹商代疾病問題^[2],具發軔之功,衍生了為數不少的相關論文^[3],亦帶動學界關注中國上古時期醫療史的研究。以科技史、社會史角度重構上古醫療的著作,也見出爐,如溫少峰、袁庭棟的《殷墟卜辭研究——科學技術篇》^[4]、李民的《殷商社會生活史》^[5]、宋鎮豪的《夏商社會生活史》^[6]都是代表作。

縱使上古醫療史的研究成果已見成熟,但礙於材料不够完備,或誤釋、誤說甚多,個別議題仍有可發掘之處。“蠱”作為一個與疾病有關的名詞,在古代醫學或非醫學的文獻中屢見不鮮。然而,前人多把視野聚焦在畜蠱害人之上,忽略了“蠱”在醫學疾病中的意義。先秦文獻中罕見有關畜蠱害人的記載,漢武帝晚年發生的“巫蠱”案中的“巫蠱”,是指木偶巫術,並非本文所論的“蠱”^[7]。

《說文解字》載:“蠱,腹中蟲也。《春秋傳》曰:‘皿蟲為蠱,晦淫之所生也。’梟桀死之鬼亦為蠱。”^[8]許慎認為“蠱”是人腹中之蟲,可理解為寄生蟲,他又引《春秋傳》的解釋,謂男子惑於女色過度即會導致生蠱疾,並受梟桀酷刑強死者的魂魄也會依附於人體而變成蠱。

漢代的說法為我們理解中國上古時的“蠱”提供了一個切入點。本文以先秦史料入手,試圖探索“蠱”在中國上古醫療史的意義,並分析古人防“蠱”和治“蠱”之法。

二、甲骨卜辭中的“蠱”

蠱,甲骨文寫成“”或“”,為象形字,反映皿中有蟲。甲骨卜辭屢見“蠱”,並且已涉及疾病:

(1) 貞:王骨唯蠱

(《合集》201)

貞：王骨不唯蠱

(2) 有疾齒，唯蠱虐 (《合集》13664)

(3) 王疾蠱 (《乙》5393)

例(1)是武丁時期的卜辭，辭中的“王”當指武丁無疑。從上引三例可見，“蠱”是導致人類齒痛及骨痛的蟲。例(1)中骨患“蠱”，可能指骨結核或《靈樞》中的“骨蝕”^[9]。胡厚宣就認為“从蟲从皿，會意，言皿中之蟲，即造蓄蠱毒之法”^[10]，溫少峰、宋鎮豪則指“卜辭中以蠱為病名”，“即腹中之蟲”，認為蠱即寄生蟲^[11]，亦有學者認為“蠱”是“蠱脹病”，因“皿”、“血”體近，“皿”上有“蟲”，實即血中有蟲，中醫也有所謂的“蟲鼓”^[12]。

“蠱”在甲骨文還有一例：

(4) 貞：母丙允有蠱

貞：母丙亡蠱

王占曰：母丙有蠱 (《合集》2530)

例(4)同是武丁卜辭，而例(4)是貞母丙的鬼魂為害引起蠱，是祖先降咎的例子，說明殷商時期，“蠱”與鬼神因素已糾纏不清，故此，詹鄞鑫提出“蠱”有“蟲的本質”，亦有“神的性質”^[13]。

殷人亦認為“蠱”為害很大，同是武丁時期的賓組卜辭有：

(5) 不唯蠱虐 (《合》17187)

(6) 丙子卜……蠱虐 (《合》8857)

(7) 癸丑卜，設貞：召戔，出蠱羌 (《合》264)

《尚書·金縢》載“遘厲虐疾”，孔傳：“虐，暴也。”^[14] 蠱虐連稱，蠱可造成很大的傷害。而“戔”與“蠱”同列，可見“蠱”可引申為災害的意思^[15]。雖然甲骨文牽涉“蠱”字的資料不多，但多少反映出殷人認為“蠱”既是一種疾病名稱，亦是病因。

三、清華簡中的“蠱”

清華簡《祭公之顧命》簡 15、16 中，祭公告誡周穆王之語云：

女(汝)母(毋)呂(以)戾(災)辜(罪)蠱【15】芒
(芒—亡)寺(時)寔(遠)大邦，女(汝)母(毋)呂(以)俾
(嬖)設(御)息(塞)尔(爾)臧(莊)句(后)。^[16]

今本《逸周書·祭公》亦載：

汝無以戾罪疾喪時二王大功，汝無以嬖御固莊
后……^[17]

兩段文字相似，當指同一事無疑。舊譯《逸周書》有兩個解釋，分別作“你不要因乖戾、背理、罪民、嫉妒而喪失這二王的大功”^[18]或“你不要因乖戾、反常、罰罪、嫉妒喪失了這二王的大功”^[19]，兩種釋法大同小異。

簡文中“戾災辜蠱”的“戾”讀為“厲”、“癘”，指瘟疫，已得文獻支持^[20]，而蠱字則大有討論的餘地。清華簡原整理者釋“蠱”為“辜”，但出土文獻裏表罪辜之“辜”者，金文作“故”；秦系文字用“辜”；楚卜筮祭禱簡用“𠄎”或“𠄎”。這些跟原簡的“蠱”似都無關聯。蠱从“虫”旁，為蟲的異體，而“古”為其聲符，剛巧與“蠱”古音全同，則蠱應該就是“蠱”的形聲結構的異體^[21]。黃懷信已指出“戾茲罪辜”不可通，並引《尚書》為例，“罪辜”當如“罪疾”，指先王所降之罪^[22]。然則，“戾災辜蠱”就不能解作周王自身不當的行為，而是周王不當的行為招致之“戾災辜蠱”，祭公所言，就是告誡天子行為失當導致天降已喪而亡周。事實上，“辜蠱”已多見於出土文獻。天水放馬灘秦簡《日書》就有：

上多下少，事君有初毋（無）後，賈市行販皆然，唯利貞
 臯蠱、言語。【243】^[23]

此簡的“言語”當指不好的言語、閑話。“臯蠱”就應指有得臯（罪）之事和因蠱而引致疾病之意。結合清華簡來讀，“戾災臯蠱”就是“蠱毒的傳染病”意思。

四、先秦其他文獻中的“蠱”

除了出土文獻的資料外，傳世文獻《左傳》一段有關醫和論晉平公患病原因的記載，亦涉及“蠱”。《左傳·昭公元年》載：

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為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24]

又曰：

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25]

最後醫和向趙孟解釋“蠱”：

淫溺惑亂之所生也，於文，皿蟲為蠱，穀之飛亦為蠱。
 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26]

何以醫和提出“疾如蠱”，而非“疾為蠱”？孔穎達《正義》言：“蠱者，心志惑亂之疾，若今昏狂失性……如彼惑蠱之疾也。蠱是惑疾，公心既惑，是蠱疾而云如蠱者，蠱是失志之疾，名志之所失，不獨為女……病有鬼為之者，有食為之者，此病非鬼非食，淫於女色，情性感亂以喪失志意也。”^[27]從孔穎達的解說可見，“蠱”是“心志惑亂之疾”，“淫溺”是“蠱”的成因，“惑亂”乃“蠱”的疾狀。晉平公之病因是近女性，由是之故，“蠱”作為病因而言，只是一個總稱，晉平公的病可直接歸因於“蠱”，而《左傳》原文說“疾如蠱”，又稱“惑蠱之疾”，就存在矛盾。這種矛盾反映了上古時期，人們對“蠱”仍未有很確切的定義。

杜預注“穀之飛亦爲蠱”時說：“穀久積則變爲飛蟲，名曰蠱。”^[28]東漢王充言“穀蟲爲蠱，蠱若蛾矣”^[29]，至清代劉寶楠解釋：

穀久積則皮碎脫，迎風揚之則皮碎脫者皆飛，小如蠛蠓，似蟲之飛，故曰：“穀之飛爲蠱。”此蠱指穀皮言。若《論衡·商蟲篇》：“穀蟲曰蠱，蠱若蛾矣。”是穀中所生蟲，雖亦名蠱，而不可以解《左傳》穀飛之文。杜注未明晰。^[30]

王充把“蠱”視爲蟲，而劉寶楠把《左傳》的“蠱”釋爲穀皮，是兩種對“蠱”的不同詮釋。

“蠱”亦爲《周易》其中一卦。杜預注“女惑男”一句時指：“巽下艮上，蠱。巽爲長女，爲風；艮爲少男，爲山。少男而說長女，非匹，故惑。山木得風而落。”^[31]這是說男子是因爲“惑”而喜歡年齡比自己長的女子，也就是喪失心志，是爲“蠱”，所以孔穎達疏云：“人自有無故失志，志性恍惚，不自知者，其疾名爲蠱。”^[32]孔穎達的《周易正義》解釋“蠱卦”說：“褚氏云：‘蠱者惑也。物既惑亂，終致損壞，當須有事也，有爲治理也。故《序卦》云：蠱者事也。’謂物蠱必有事，非謂訓蠱爲事義當然也。”^[33]孔穎達引褚仲都言，認爲《周易》的“蠱”作“事”講，但“事”不是“蠱”的本義，而是“惑”的引申。“蠱”是字義變更之後的理解，其本義是“惑”^[34]。

在中醫學的視野，“蠱”確是一種疾病名稱，泛指由蟲毒結聚，絡脈瘀滯而致脹滿、積塊的疾患。成書於戰國時代的《素問》，與《靈樞》合稱《黃帝內經》，是通過黃帝與岐伯的對話，闡述解剖學、生理學和治療方法的醫書。《素問·玉機真藏論》中言：

今風寒客於人，使人毫毛畢直，皮膚閉而爲熱……弗治，病入舍於肺……弗治，脾傳之腎，病名曰疝瘕，少腹冤熱而痛，出白，一名曰蠱，當此之時，可按、可藥。^[35]

考《康熙字典》“疝”、“瘕”二字之義，都是指腹痛的病，“瘕”更是指腹中短蟲^[36]。而《素問》中的意思，當指因風熱與濕相結而致小腹熱痛，溺竅流白色黏液，或因風寒氣結，腹皮腫起，腹痛牽引腰背。

事實上，先秦文獻《六韜》已言“蠱”是騙人方術的一種：

偽方異伎，巫蠱左道，不祥之言，幻惑良民，王者必止之。^[37]

因為“巫蠱”是詭詐的技藝和害人的邪道，君主要制止。值得注意的是，《六韜》與上舉幾種先秦文獻不同之處在於，《六韜》把“蠱”與“巫”結合，而當中的醫學疾病內容已不復見。說明戰國時期“蠱”已漸過渡成方術之類。孫思邈曾論述蠱毒，但所指的亦是巫術，亦無明確說蠱為致因。晉平公疾蠱因房事過度之故，也不見於醫書。

無論甲骨卜辭的資料或其他文獻，“蠱”都是一種能引致疾病的蟲。現代中醫學確有“蠱鼓”之病，李中梓提出：“鼓脹者，中空無物，腹皮絀急，多屬氣於也。蠱脹者，中實有物，腹形充大，非蠱即血也。”^[38]“蠱鼓”的表徵是腹部隆起，這由一種腹中寄生蟲而引起^[39]。從現代醫學知識而言，寄生蟲一般寄居入侵的內臟和血管，因此寄生蟲或其蟲卵可以在血液、受感染的器官組織或排泄物中找到，這類的蟲一般都不能以肉眼看見^[40]。由此可見，古人假想有“蠱”這類蟲，卻不一定說明是基於古人見到的“蠱”而引起。日本學者小曾戶洋更言：“古代中國中毒性的疾患皆稱‘蠱毒’，其中包括由多種原因引起的病癥，如無法解釋的中毒癥，人為的毒殺，非口服的中毒，有毒氣體的中毒，微生物的感染癥等。”^[41]

五、如何防“蠱”和治“蠱”

受惠於出土及傳世文獻，中國古代醫療史的探索遂更形豐

富,其中有關上古時期防“蠱”與治“蠱”之法也不難得知。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的《五十二病方》成書於秦漢之前,書中記錄“蠱”為病種,共有五條治療方法:

第一治方:蠱者:燔扁(蝙蝠)輻(蝠)以荆薪,即以食邪者。

第二治方:燔女子布,以飲。

第三治方:蠱而病者:燔北鄉(向)並符,而烝(蒸)羊尼,以下湯敦符灰,即□□病者,沐浴為蠱者。

第四治方:病蠱者:以烏雄雞一,蛇一,並直(置)瓦赤鋪(黼)中,即蓋以鋪,鋪東鄉(向)灶炊之,令雞、蛇盡燹,即出而治之。令病者每旦以三指最(撮)藥入一柸(杯)酒若鬻(粥)中而飲之,日壹飲,盡藥。已。

第五治方:蠱:漬女子未嘗丈夫者□□音。治桂入中,令毋臭,而以□飲之。

五條治方多少反映上古時期的藥理思想。第一治方是說患了蠱病,用荆木把蝙蝠燒成粉末,加以飲之,讓蝙蝠到腹內吃掉邪惡的東西;第二條治方是燃燒已使用的婦女月經布,加以飲用;第三條治方是將朝北開門兩側的桃枝取下,並燒成灰,將羊的臀部肉蒸熟,用羊肉的湯調和符灰喝下,然後洗澡;第四條治方是患蠱的人以烏雄雞一雙、蛇一條,配以黼甫中乾煎至燹黃,將鬲蓋好,把黼放到灶門東向的灶上煎烤,烤後粉碎為末,患者每日取三指撮服下;第五條治方是將一位未婚女子的月經布浸漬出水,取汁一杯,將粉末搖勻,患者加酒飲下。

這類近乎“怪力亂神”的治療方法,似是針對“蠱”毒的神秘性。筆者認為,馬王堆漢墓資料的治方對我們理解上古醫療史中的“蠱”有啓發意義。馬王堆的醫書藏本是從墓主生前擁有的書籍中挑選出來,這些寫本都是下葬前已編好,不可能專門為下葬而製作,《荀子》就曾指出隨葬品包括生器和明器,即逝者

生前所用的器物 and 為埋葬而製造的器物，下葬往往視為更換住址^[42]。馬王堆漢墓的墓主以書籍陪葬，當是深信巫術中的療效，更反映漢代上層精英社會不將醫巫分家的思想。這亦是理性醫學知識與非理性的巫術仍然在產生微妙的交互作用。故此，夏德安 (Donald Harper) 認為儘管醫學理論已隨自然哲學而日趨專門，但巫術和醫學之間的關係仍得以延續^[43]。

在防“蠱”方面，《周禮》記載周王室設置專職防蠱：

庶氏掌除毒蠱，以攻說禳之，嘉草攻之。^[44]

東漢鄭玄注：“毒蠱，蟲物而病害人者。”^[45]對“蠱”這種能病害人的毒物，庶氏以祈神（攻說）和藥物（嘉草）對付。據一些零碎材料可見，蠱具體又分為水蠱、蠹蠱、厲蠱，水蠱可以牡菊灰酒除去^[46]，蠹蠱亦可以莽草熏之^[47]。而《史記·秦本紀》亦記載秦德公二年“初伏，以狗禦蠱”^[48]，說明戰國時期有國君以狗祭來防蠱。

除了經、史資料，子部的《山海經》亦有涉及防蠱之法：

有獸焉，其狀如狐而九尾，其音如嬰兒，能食人，食者不蠱。^[49]

其中多鯨魚……食者無蠱疾，可以禦兵。^[50]

其中多三足鱉，枝尾，食之無蠱疫。^[51]

雖然這些防蠱之法荒誕怪異，未足為信，但至少說明蠱患是上古時期一種頗流行的疾病。

六、從“蠱”看中國上古的病因觀

中國上古的史料中，“蠱”作為病名和病因斷無可疑，但這種疾病看似怪異，既無明確病徵，治病之法又近於怪異。事實上，這正反映上古時期先民對於疾病的恐懼。

在先秦文獻中，“蠱”由最初是生於器皿中的蟲，穀物腐敗後所生飛蛾以及其他物體變質而生出的蟲也稱“蠱”，後來則演變成造蠱害人之術。“蠱”的神秘性賦予其如同被鬼魅迷惑之感。《周禮》、《六韜》中的“蠱”已不能判別為純粹的疾病原還是害人之術。《漢書·江充傳》中的“蠱”似乎把“蠱”的醫學性與害人木偶之說連上關係：

是時，上春秋高，意多所惡，以為左右皆為蠱道祝詛，窮治其事。丞相公孫賀父子，陽石、諸邑公主，及皇后弟子長平侯衛伉皆坐誅。……充典治巫蠱，既知上意，白言宮中有蠱氣，入宮至省中，壞御座掘地。上使按道侯韓說、御史章贛、黃門蘇文等助充。充遂至太子宮掘蠱，得桐木人。^[52]

江充掘蠱一事可證明巫蠱與醫事有涉，他利用漢武帝畏巫蠱的弱點，嫁禍於衛皇后和戾太子劉據。江充“得桐木人”就是指江充“以針刺其(桐人)腹，埋太子宫中”^[53]，這種以針刺腹之事，就是巫蠱術中製桐人之術。“曉醫術”的江充^[54]，大概知道針刺胸腹乃為禁忌：

凡刺胸腹者，必避五藏。中心者環死，中脾者五日死，中腎者七日死，中肺者五日死，中鬲者，皆為傷中，其病雖愈，不過一歲必死。^[55]

針刺桐人之腹是欲致武帝於死地吧^[56]！由此，江充以醫說解巫蠱刺腹之理，把“蠱”完全變成一種害人厭勝之術。

事實上，在古代社會，一個人“無故”患病，其實必須考慮鬼神或巫者為祟^[57]。人鬼同域，睡虎地秦簡《日書》就顯示鬼會騷擾、戲弄人，甚至讓人生病致死。面對這些特性不一的鬼神，《日書》提供不同的自力救濟方法^[58]。就算在東漢成書的《神農本草經》^[59]，也視“蠱”是與鬼祟相關的病，要以龍膽、鬼臼來治之^[60]，這至少反映至東漢之世，古人仍認為鬼邪是致病的原

因之一。

“蠱”作為一種疾病，從商代以降，都不離鬼神作祟的因素。一些不知起因的疾病都歸咎於“蠱”，並賦予“蠱”的神秘性，與鬼神觀柔和，這不是鬼神導致疾病，而是恐懼是一切病痛想像的根源。《論衡·訂鬼篇》云：

病者困劇身體痛，則謂鬼持箠杖毆擊之，若見鬼把椎鑊繩纏立守其旁。病痛恐懼，妄見之也。初疾畏驚，見鬼之來；疾困恐死，見鬼之怒；身自疾痛，見鬼之擊；皆存想虛致，未必有其實也。^[61]

王充批評鬼神致病的說法，無疑是合理的^[62]，但這段記載反映出的卻是古人對病因的恐懼。

然而，隨著經驗累積，古人對自身已掌握的知識充滿信心，甲骨卜辭於第一期以後，幾乎不再占問禦除疾病之事，考古發現亦證實至遲在早商時期，古人已掌握藥物貯藏方法^[63]，春秋時代，已有比較理性的疾病觀，例如晉侯有疾，就請來秦國的醫生看病^[64]，除反映秦國醫學較為發達先進外，進步的理性觀與鬼神致疾的觀念並存於春秋時代，後來更出現《史記·扁鵲倉公列傳》中“信巫而不信醫，六不治也”^[65]的議論。上文提到的晉醫以為蠱疾為“淫溺惑亂之所生”，就不存在鬼神對疾病的影響。以《黃帝內經》為代表的戰國末年以來的醫學思想將陰陽不調視為致疾原因，其中雖不無神秘思想，但仍是在朝理性思考發展^[66]。

七、結 語

古代人類生存條件極差，容易感染疾病，只有從生活經驗中總結出某種治療方法後，才能對症下藥^[67]。不過，古人面對一些“無故”而起的疾病時，似乎也大傷腦筋。本文考察“蠱”字在

上古醫療史中的意義,認為“蠱”很有可能是今天所指的寄生蟲或為害人類的毒蟲,但以古人的技術而言,他們不可能得見這些“蠱”,從這層意義上,“蠱”乃是一種疾病,亦是客觀存在的“有蠱”;此外,“蠱”不失其神秘性,這亦代表“蠱”是一種病因。古人由於不知“蠱”的真相,於是使人們賦予“蠱”無限的想像性,這種“無蠱”的“蠱”遂反映在巫術之上。從此可窺見商代以至戰國時代前後,疾病具有自然與邪靈二種身份,“蠱”亦成為這類醫療觀念的見證^[68]。

(作者:香港浸會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研究生)

本文引書簡稱表(甲骨卜辭部分)

董作賓:《小屯·殷虛文字乙編》	《乙》
郭若愚:《殷虛文字綴合》	《合》
郭沫若:《甲骨文合集》	《合集》

注釋:

- [1] 如陳垣早年曾寫過多篇有關疾病和醫學方面的文章,如《牛痘入中國考略》、《中國解剖學史料》等,均見陳智超、曾慶瑛編:《陳垣學術文化隨筆》(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0年),頁59—66、78—84;陳寅恪也有數篇論文涉及疾病與醫學,見氏著:《狐臭與胡臭》、《〈三國志·曹沖華佗傳〉與佛教故事》,均收入氏著:《寒柳堂集》(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頁157—160、176—181。

- [2] 收入氏著：《甲骨學商史論叢初集》（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頁302—325。
- [3] 如楊樹達：《讀胡厚宣君〈殷人疾病考〉》，載氏著：《積微居甲文說》（北京：中國科學院出版社，1954年），卷下，頁58—61；陳世輝：《殷人疾病補考》，《中華文史論叢》（上海：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1963年），第4輯（1963年10月），頁138；范毓周：《〈殷人疾病補考〉辨正》，《東南文化》，1998年第3期（1998年5月），頁98—99。
- [4] 溫少峰、袁庭棟：《殷墟卜辭研究——科學技術篇》（成都：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3年）一書列舉三十四種疾病，以卜辭例證解釋，頗為翔實。
- [5] 李民：《殷商社會生活史》（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基本依隨胡厚宣文及溫、袁二人書的論調。
- [6] 宋鎮豪：《夏商社會生活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一書列舉三十九種疾病，但缺乏卜辭例證及論述，解釋亦嫌簡單。
- [7] 據詹鄞鑫的意見，害人巫術之所以稱為“巫蠱”，說明此前一定流行過以“蠱”害人的巫術，這是害人術得以稱為“巫蠱”的前提。詳參詹鄞鑫：《心智的誤區：巫術與中國文化》（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頁546，注釋1。
- [8] 許慎：《說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卷一三下，《蟲部》，頁284下。
- [9] 張焯：《商代醫學文化史略》（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2005年），頁105。
- [10] 胡厚宣：《殷人疾病考》，收入氏著：《甲骨學商史論叢初集》，頁321。
- [11] 溫少峰、袁庭棟：《殷墟卜辭研究——科學技術篇》，頁325—326；宋鎮豪：《夏商社會生活史》，頁415。
- [12] 李良松、郭洪濤：《中國傳統文化與醫學》（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1989年），頁48。
- [13] 詹鄞鑫：《卜辭殷代醫藥衛生考》，《中華醫史雜誌》1986年第1期（1986年1月），頁15—23。
- [14] 孔穎達疏：《尚書正義》（阮元校《十三經注疏》本，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卷一三，《金縢》，頁196。
- [15] 朱歧祥：《殷墟甲骨文字通釋稿》（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9年），頁353。
- [16]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上海：中西書局，2010年），頁174。

- [17] 黃懷信、張懋鎔、田旭東等：《逸周書彙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卷八，《祭公解》第60，頁999—1000。
- [18] 黃懷信：《逸周書校補注譯》（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1996年），頁369—370；黃懷信：《逸周書校補注譯（修訂本）》（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頁342。
- [19] 張聞玉：《逸周書全譯》（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頁286。
- [20] 《墨子》“疾菑戾疫”（孫詒讓：《墨子閒詁》〔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卷三，《尚同中》第12，頁82）的“戾疫”等同《墨子》“今歲有癘疫”（孫詒讓：《墨子閒詁》，卷四，《兼愛下》第16，頁119）的“癘疫”，均可作瘟疫解。《左傳·昭公元年》：“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祭之。”孔疏云：“癘疫謂害氣流行，歲多疾病”（杜預注，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正義》〔阮元校《十三經注疏》本〕，卷四一，《昭公元年》，頁2024）。A. F. P. Hulswé（何四維）就指出“癘”在睡虎地法律文書中用於指部分與麻風病相當的疾病。詳參A. F. P. Hulswé, *Remnants of Ch'in Law: An Annotated Translation of the Ch'in Legal and Administrative Rules of the 3rd Century B. C.*, (Leiden: E. J. Brill, 1985), p. 197. 另外，林富士把“癘”與法律條文中的“癘者有（罪），定殺”分析，得出癘者犯了罪後除了被處死外，尚具有祭儀上的意義。詳參林富士：《試釋睡虎地秦簡中的“癘”與“定殺”》，《史原》，第15卷（1986年），頁1—38。
- [21] 陳劍：《清華簡“戾災旱蠱”與〈詩經〉“烈假”、“罪罟”合證》，（“清華簡與《詩經》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2013年11月1—3日，香港浸會大學），頁6。
- [22] 黃懷信：《清華簡祭公篇校釋》，載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清華簡研究》（上海：中西書局，2012年），第1輯，頁235。又，本段論述頗得益於本文的一份匿名審查書，謹申謝忱。
- [23] 張德芳編，孫占宇注：《天水放馬灘秦簡集釋》（蘭州：甘肅文化出版社，2013年），頁260。
- [24] 杜預注，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正義》，卷四一，《昭公元年》，頁2024。
- [25] 同上書，頁2025。
- [26] 同上注。
- [27] 同上書，頁2024。

- [28] 同上書，頁 2025。
- [29] 黃暉：《論衡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90），卷一六，《商蟲》第 49，頁 717—718。
- [30] 劉寶楠：《釋穀》（收入中國文化研究會編：《中國本草全書》，北京：華夏出版社，1999 年，256 冊），卷一，頁 476。
- [31] 杜預注，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正義》，卷四一，《昭公元年》，頁 2025。
- [32] 同上注。
- [33] 孔穎達疏：《周易正義》（阮元校《十三經注疏》本），卷三，《蠱》，頁 35。
- [34] 前儒對《周易》中“蠱”的理解，可詳參劉保貞：《〈周易〉蠱卦與中國古代蠱信仰風俗》，《孔子研究》2007 年第 4 期（2007 年 7 月），頁 82—89。
- [35] 《素問》（北京：中國醫藥科技出版社，1998 年），卷五，《玉機真藏論》第 19，頁 115。
- [36] 張玉書等：《康熙字典》（臺北：泉源出版社，1990 年），頁 697、705。
- [37] 曹勝高、安娜譯注：《六韜》（北京：中華書局，2007 年），頁 37。
- [38] 李中梓：《醫宗必讀》（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87 年），卷七，《水腫脹滿》，頁 207。
- [39] 明代醫師李樾注意到女性月經阻塞的起因之一是害蟲的存在，由於會造成女性腹部隆起，形成妊娠的外觀。他解釋此一通則說，假如一個顯然懷孕的婦女苦於腹部疼痛或一直延遲生產，大概是體內害蟲所致。詳參氏著：《醫學入門》（南昌：江西科學技術出版社，1988 年），卷五，《內傷類》，頁 869。
- [40] 上文的醫學知識，得高加信博士及洪俊強醫師惠告，特此致謝。
- [41] 小曾戶洋、長谷部英一、町泉壽郎：《五十二病方》（東京：東方書店，2007 年），頁 209。
- [42] 王先謙：《荀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8 年），卷一三，《禮論篇》第 19，頁 369。
- [43] Donald Harper, “Warring States, Qin, and Han Manuscripts Related to Natural Philosophy and the Occult,” in Edward L. Shaughnessy (ed), *New Sources of Early Chinese History: An Introduction to the Reading of Inscriptions and Manuscripts* (Berkeley: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Early China and the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1997), p. 234.
- [44] 鄭玄注、賈公彥疏：《周禮注疏》（阮元校《十三經注疏》本），卷三七，《庶

氏》，頁 888。

- [45] 鄭玄注、賈公彥疏：《周禮注疏》，卷三七，《庶氏》，頁 888。
- [46] 同上書，《蠲氏》，頁 880。
- [47] 同上書，《翦氏》，頁 880。
- [48] 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 年），卷五，《秦本紀》，頁 184。
- [49] 郭璞、郝懿行注，袁珂譯注：《山海經》（臺北：臺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1996 年），卷一，《南山經》，頁 8。
- [50] 同上書，卷五，《中山經》，頁 196。
- [51] 同上書，卷五，《中山經》，頁 232。
- [52] 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 年），卷六三，《蒯伍江息夫傳》，《江充》，頁 2742。
- [53] 《太平御覽》引《三輔舊事》，李昉：《太平御覽》（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 年），卷八三〇，《資產》，《醫針附》，頁 730。
- [54] 同上注。
- [55] 《素問》，卷四，《診要經終論第十六》，頁 88。
- [56] 李建民：《〈漢書·江充傳〉“桐木人”小考》，《中國科技史料》，第 22 卷第 4 期（2001 年），頁 360—362。
- [57] 李建民：《先秦兩漢病因觀及其變遷——以新出土文物為中心》，載氏編：《從醫療看中國史》（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8 年），頁 49。
- [58] 詳參劉樂賢：《睡虎地秦簡〈日書·詰咎篇〉研究》，《考古學報》，1993 年第 4 期（1993 年 4 月），頁 435—454。
- [59] 王家葵、張瑞賢：《神農本草經研究》（北京：北京科學技術出版社，2001 年），頁 39。
- [60] 楊鵬舉：《神農本草經校注》（北京：學苑出版社，2004 年），頁 49、254。
- [61] 黃暉：《論衡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90 年），卷二二，《訂鬼篇》，頁 931—932。
- [62] 徐復觀認為王充是思想史上首位不以人倫道德為出發點而探求知識的思想家，從純粹追求知識的角度而言，《訂鬼篇》的確對鬼神之說辯難。韋政通就認為“王充是中國思想史上最大的批評家”，王充的“疾虛妄”就是對鬼神之說抱批評立場，以求破除迷信。詳參徐復觀：《兩漢思想史》（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76 年），卷二，頁 582、603—608；韋政通：《中國思想史》（上海：上

海書店出版社,2006年重印),頁373—376。

- [63] 耿鑒庭、劉亮:《藁城商代遺址中出土的桃仁和郁李仁》,《文物》,1974年第8期(1974年8月),頁54—55。
- [64] 杜預注,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正義》,卷二六,《成公十年》,頁1906。
- [65] 司馬遷:《史記》,卷一〇五,《扁鵲倉公列傳》,頁2794。
- [66] 蒲慕州:《追尋一己之福:中國古代的信仰世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頁137。
- [67] 許進雄:《中國古代社會:文字與人類學的透視》(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年),頁492。
- [68] Donald Harper, *Early Chinese Medical Literature: The Mawangdui Medical Manuscripts* (London & New York: Kegan Paul International, 1997), pp. 74—75.

Visible or Invisible? *Gu* in Early Chinese Medical History

Chan Ka-lai

(Ph. D. Candidate, Department of History,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Abstract:

Scholarship on Chinese medical history has made considerable progress since last century. However, despite its frequent occurrences in ancient medical and non-medical documents, the word *gu*, a term associated with diseases, has only been studied in light of the practice of “collecting *gu* to harm others” in previous scholarship, no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its meaning in the medical study of diseases. Making use of inscriptions on oracle bones, bamboo slips preserved at Tsinghua University, and other pre-Qin documents, this essay aims to (1) explore the meaning of *gu* in pre-Qin contexts, (2) discuss how ancient people prevented and treated *gu*, and (3) observe the concepts of illnesses and medical treatments in ancient times.

Keywords: *Gu*, Schistosoma, Preventing *gu*, Treating *gu*, Ancient medical history, Diseases in ancient times